

# 以中美投资协定确立巨型经济体合作范式

章玉贵

## 中美BIT谈判 关乎全球经济前景

在博鳌亚洲论坛“中美投资协定”分论坛上，中美有关与会代表均对业已取得重要进展的中美 BIT 谈判前景持乐观积极态度，表明在全球经济面临脱轨风险、投资贸易规则呈现碎片化与集团化的背景下，作为全球两个最重要的经济体,美中在维护全球经济与金融稳定、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投资贸易新规则等方面保持高水准合作,不可或缺。

根据商务部前部长陈德铭的判断，中美 BIT 谈判应该快到终点，因为文本谈判的重要核心内容已经结束；而双方在极为重要且敏感的负面清单与出价问题上正朝着达成最终妥协的方向努力。尽管要给出双方签署 BIT 谈判协定的具体时间表并不那么容易，但整体战略目标渐趋一致的两大经济体，在未来某个时间节点向世界释放达成高水平投资协定的信号,已是可以期待的现实指向。

中美 BIT 协定谈判启动于全球爆发百年一遇金融危机的 2008 年,也是中美两国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达成一致之后，双方在经贸领域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谈判项目。2013 年 7 月,双方同意进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实质性谈判,并在第十九轮

投资协定谈判中首次交换了负面清单出价，意味着极为敏感的负面清单被提到了双方的谈判桌，而在今年 1 月份的第二十四轮投资协定谈判中,双方根据两国元首去年 9 月就 BIT 谈判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围绕各自的负面清单展开深入磋商。预计再经过数轮磋商,双方将在此领域达成一致。

笔者注意到，中展展开 BIT 谈判的时间进程尽管历时近 8 年,在此期间，双方与其重要经济伙伴在贸易规则重构、双边乃至多边自贸区谈判方面亦同时进行，且各自取得了重要进展。对美国而言,无论是 2016 年 2 月 4 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12 个成员国代表在新西兰签署了该协议，表明这一巨大规模贸易协议距离真正付诸实施只是时间问题；另一方面，美欧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也在加速谈判,双方有意愿达成全面且具有高标准的协议。对中国来说,则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二是积极主导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三是以点带面,通过中韩、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与实施,渐次落实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不过,整体而言,中美各自构筑的投资与贸易版图，无论怎么扩大,均逃不开双方早已密不可分的经济联系，这也是中美最高决策者着力推动双方达成高水平投资协定的战略

出发点所在。

## 单一国家难以主导投资规则变迁

尽管舆论不时渲染 TPP、TTIP、RCEP 以及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外溢效应，尤其是作为全球最有实力和动员力的两大经济之间可能的经济碰撞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但没有人认为中国会走向经济领域的战略对抗，即便是奥巴马在 TPP 谈判取得重大突破后宣称决不能让中国书写规则，其在宣泄之后也会冷静思考，美国当真能够实现与中国的战略利益切割吗？美国当真有能力将中国排除在全球投资贸易规则制定的权力圈？

毋庸置疑，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贸易、金融早已高度一体化,相互投资规模不断增大的今天，任何主要大国都不要指望在本就是自己重要经济伙伴面前筑起投资与贸易规则隔离墙。尤其是排名全球经济前两位的美国和中国，更是如此。中国作为全球既有贸易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自加入 WTO 之后在积极承接全球投资与产业转移的同时，也将本国贸易价值链延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体量增长和渗透力方面甚至将美欧和日本这些昔日偶像逼得有点透不过气来，中国也在最近两年成为净资本输出国，一跃成为全球重要的投资大国,其中对美国的投资正在急速增长。但中国迄今取得的贸易成长本质而言并未显著改变全球既有贸易格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美欧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尽管规模不断扩大，但根本谈不上改变全球投资贸易规则。美国依然是这个世界上从贸易价值链获益程度最多的国家，尤其在服务贸易和高附加值制造业贸易方面,中国远非美国对手。而中国采取的一系列积极扩大贸易体系自主

权的对外战略,并非谋求排斥美国。中国深知，如果形成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体系对抗,肯定得不偿失。另一方面,美国要想在亚太架空中国贸易影响力,说易行难。况且中国已经表达不排除加入 TPP 的立场，正如中国欢迎美国随时加入亚投行一样，实际上是非常理性的国家思维。如果双方能够在投资协定谈判方面最终达成一致，则将形成中美共同推动全球投资贸易规则重构的局面。

## 中美亟待尽快确立经济合作范式

作为全球最为重要的两大经济体，美中复杂且紧密的经贸联系是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基石。中美正在着力推进的高水平投资协定(BIT)一旦达成最终协议，不仅有利于改变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分工格局，而且可以将为代表不同体制的超级经济体之间的有效合作提供极为重要的参照系。最终将推动全球迈向更高水平的经济合作,促进稳健增长。

对有远见的两国政治家和商业领袖而言,即便中美两国的矛盾再复杂,也不妨碍两国携手放大共同利益，并在竞合中确立两国经济合作范式。因为无论是全球层面上的经济增长、金融市场稳定、贸易新规则重构，还是中美各自复杂经济问题的有效解决，乃至两国谋求全球经济再平衡,促进本国经济稳健增长,都需两国在寻找利益共同点的基础上,打造全球层面的体系担保人角色。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 中国经济应尽快再中心化

任寿根

中国经济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仅仅依靠一线城市的单极增长,是难以实现的,也是难以持续的,同时经济发展结构方面的问题也会越来越突出。中国幅员辽阔,中国经济应当推行的一个战略是,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增加新的增长极,实现中国经济多极化。而要实现中国经济多极化，就是尽快采取再中心化措施，通过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实现经济的增长。

## 为什么要实施经济再中心化战略

所谓经济再中心化是指:在一国经济中，特别是在大国经济中,在不同的区域分布中,通过建立新的经济集聚点，建立新的城市或区域增长极，实现经济新的增长。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增长极理论,该理论认为,增长极是一种具有拉动作用、具有巨大乘数效应的经济细胞，或者是具有空间集聚特点的拉动型细胞的集合体。该理论进一步认为,经济增长一般首先发生在增长极上，经历生产要素的大规模大范围集聚之后,增长极会产生扩散效应,从而拉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与增长极相关的另一个理论是另一个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心——外国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中心与外国的边界会发生变化，区域空间关系不断调整，最终实现区域空间一体化。该理论还指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中心与外围的发展差异会逐步消失。

新供给主义理论认为，经济再中心化,是指在新的区域,尤其是在后发区域,通过城市兼并,形成一个或若干个新的特大城市,使其成为新的增长极，再逐步通过中心与外围空间结构作用力,实现后发区域的经济增长，从而拉动一国经济增长。

新供给主义理论认为，经济再中心化是一个持续过程，经济必须再中心化一般缘由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原中心城市集聚功能固化,加速化,释放负能量;第二种情况,原中心城市衰落。

中国的增长极主要集中在东部的一线城市,其集聚效应过度,对外扩散效应以及张力效应不足，这些城市经济增长的基数达到相当大的规模之后，其在边际上的增长会逐渐递减，等量的生产要素产生的增量会逐步小于投放二三线城市。通过在推动二三线城市的城市兼并，形成新的增长极，有利于形成新的中国经济增长点,新的经济增长中心,从而产生“新刺激”效应,刺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增长轨道。

## 如何实现经济再中心化

经济再中心化的实施，就是在后发地区选择合适的城市作为新的增长极,新的中心。中国经济再中心化的实施，需要采取一定的具体措施，美国经济再中心化的历史经验值得借鉴和参考。

美国初始经济中心地为纽约、波士顿、华盛顿等城市,通过开拓中西部地区，实现了经济的再中心化,使旧金山、洛杉矶等西部城市成为新的经济增长中心。

美国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发

展主要依靠“流动性”推动,这里的流动性不是以货币流动为主要特征,而是以人的流动为核心。

美国当年的发展,通过引导人口从东部往中西部流动,带动了新的城市出现和新的城市增长,从而拉动了大规模的企业投资和消费。人的流动,人的再定居,需要新的消费品,这为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特别是当年美国居民从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落后地区流动,从投资和消费“边际”或“增量”拉动作用看,无疑比人口向相反的方向移动更大。这就是美国当年经济再中心化所起的作用。当年美国经济再中心化,通过支持私人企业建设铁路,通过在铁路沿线和矿山附近建设新的城市,核心是人的再集聚、再集中。

西欧国家和日本经济衰落的重要原因是一些国家经济中心已经固化,经济再中心化的空间小,新的增长极没有形成。

在传统区域发展理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一线城市应逐步向二三线城市转移其不再需要发展的低端产业,而发展高端产业,实现所谓的“梯度发展”、“分层发展”。如果按照这种模式发展,后发城市永远落后。后发城市同样可以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美国 20 世纪 50 年代就是在相对后发的西部地区发展新兴产业,发展高端产业,才有今天的“硅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在东部沿海地区实施制度分割战略,如税收优惠,使东部地区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心,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策源地。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应实施经济再中心化策略,在继续稳定一线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在中西部地区建立新的经济中心,实现区域经济的多极化发展。

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单靠一线城市经济的发展,那么至少会造成三个方面的不利结果:第一,由于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人口规模巨大,世界第一,大量人口继续源源不断地流向一线城市,同时其他生产要素会继续向一线城市集聚,这会进一步加剧一线城市的公共管理难度,把一线城市“挤爆”,使一线城市人口过多而变得拥挤不堪,从而加剧一线城市的城市病问题,如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看病难、上学难,等等。第二,不利于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第三,内部需求大规模增加难以持续。

## 经济再中心化可采取三步走策略

中国经济再中心化,可以解决中国经济单极增长问题,就可以解决区域边际增长递减难题。中国经济再中心化,新的特大规模城市的出现,必然引起人口流动,而居民到了新的定居点之后,需要大量的新的消费品,从而拉动消费需求,有利于去库存。

中国经济再中心化可以采取分三步走的策略:第一步,在中部地区,选准一个区域或两到三个区域,兼并若干个三四线城市,成立一个或若干个特大城市,形成一个或两到三个新的增长极。第二步,在东北地区采取同样的方式,形成一个或两到三个新的增长极。第三步,在西部地区也采取相同的方式。通过分布实施,使中国经济再中心化具有连续性。

中国经济再中心化,可以继续采取在后发地区实施税收优惠等制度分割措施,可以采取在后发区域设立新的直辖市的形式促进新的增长形成。

# 一线城市楼市调控的纠结

李宇嘉

近日，一线城市主政者打压楼市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比如上海要将二套房首付比例上调至 50%(普通住房)、70%(非普通住房)，外地人限购社保缴纳时间从 2 年上调至 5 年；深圳非户籍人群购房的社保缴纳年限,将从原来的 1 年调整至 3 年。事实上，一线城市要出台严厉政策打压楼市的消息,在春节前后就开始疯传了,但各级主管机构在“两会”上的表态,给了一个信号，即一线城市调控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也就是要加大土地和住房供应,特别是保障房供应。

一线城市楼市调控基调的风向转变，一方面在于契合全国“去库存”的大潮流,即作为楼市的领头羊，一线城市楼市动向是二三四线城市楼市的先行指标。因此,除了整顿市场秩序,特别是打击以“首付贷”为主的场外加杠杆,避免过分投机炒作,造成类似于 2015 年年中股市动荡外,需求端的抑制措施基本上过时了;另一方面,经济转型过渡期叠加阵痛期,货币大周期宽松,加上制造业去掉的杠杆要往居民身上加,楼市大周期繁荣是必然趋势。

由此,楼市进入由货币(非人口)驱动下的景气周期，而一线城市楼市是资产配置的最佳选择，特别是在优质资产稀缺的情况下。因此,任何需求端的抑制,或许仅仅是一个短期脉冲,影响很快消褪。与其在需求端打压,不

如顺应需求在供给端发力，以这一举获得平抑一线城市房价、助力去库存、发挥楼市稳增长的多得。这就是缘何，一线城市楼市调控传言的鞭子轻轻地放下了。

如同 2015 年股市激活创业热情被“利用”一样，政府信用的介入扭曲了投资者的行为。因为,三四线城市楼市是没得救了，只能把大把的钱投入到一线及二线重点城市，类似于去年炒创业板一样。因此,一线城市房价在新年之后继续飙升,深圳和上海的房价 2 月份同比分别上涨了 57.8%和 25.7%，这是史无前例的上涨，而上海近期涨势更似要续写 2015 年深圳楼市的神话。同时,南京、杭州、广州、苏州和合肥等重点城市或将成为下一波暴涨区域。

货币似水更似蜜,我们不能退回到计划体制把钱管死的时候,而金融通渠道远远不是监管部门能堵得住的。此时,如果一线及二线重点城市房价暴涨,将会产生从其他区域,从股市、债市等抽走大量资金的现象,即所谓的资金“虹吸效应”。这不利于去库存,也不利于稳增长,因为一线城市的楼市,无论是在新开工、拿地还是开发投资,占比都在 30%以下。

因此，若一线及二线重点城市房价暴涨,打压式调控是必然的。如果说一线城市购房门槛较高，那么重点二线城市

## 非法经营疫苗案涉案药企增至13家



举国关注假疫苗,輿情汹汹人心焦。百姓生命当儿戏,黑贩良心被狗咬。依法治市年年喊,落实层面太糟糕。腐败形成产业链,监管切勿马后炮。

赵乃育/漫画  
孙勇/诗

# 经济疲弱下货币增速仍将缓降

胡月晓

2 月份的实体部门融资中,信贷增长超越了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表明实体经济的融资完全回归到了银行信贷,其它社会融资方式全部回落，整体上呈现了收缩态势，其中票据融资减少 3707 亿元。不过,社会融资重回银行仅是季节性现象,是春节月份特有的社会现象。新增信贷规模回落显然受到了货币当局的引导、控制,但社会融资规模更大程度的回落，表明了实体经济部门真实融资需求的低迷态势并未发生改变。从规模上看,2 月份的社会融资和新增信贷规模相当,扣除同业放贷后实体部门新增信贷还超越了社会融资水平，社会融资重回银行渠道,但这仅是短期现象,长期来看的实体部门社会融资多元化趋势,不会改变。

从新增信贷的部门分布看,2015 年

10 月份以来,金融同业投放的规模呈现持续减少态势,表明金融市场从银行体系的融资规模在逐步下降,银行体系创造的流动性流入金融领域的规模在逐步减少,越来越多的银行体系流动性开始回流到实体,但整体而言,资金“脱实向虚”的格局并未发生改变,当前企业部门存在的高额融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财务性的融资需求，即是为了维持高杠杆的被动型财务性融资,并非是扩张驱动的经营性融资。结合当期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动荡局面看，新增资金进入金融领域的很少。相反,伴随金融市场运行风险暴露压力的上升，资金回归商品市场等实体经济领域的避免需求在增加。

2 月信贷规模相对 1 月有显著回落,环比少增 17834 亿元,和往常相比,回落并不显著,同比少增 2970 亿元;整体看，

当前信贷增长的回落仅是同业影响逐渐减少的过程。自从 2015 年将金融同业投放计入新增信贷统计范围以来，受资本市场变化和国家队政策的影响，银行部门对非银部门的信贷在 2015 年 7 月有个爆发性的增长，并直接导致了信贷增速的突然抬升。随着资本市场波动冲击的消除,同业投放规模逐渐减少,信贷余额增速也逐渐回落。2 月份的信贷结构变化,仍然处在这一过程当中,我们预计信贷余额增速回落到 14%的水平,才是正常信贷增长速度。从信贷和经济间的关联关系看，短期信贷与当期经济活跃程度较为相关，中长期信贷与经济运行前景较为关联。短期信贷的大回落表明,短期经济运行存在着再下行的风险;但中长期信贷维持正常的态势又表明,经济虽然存在下行压力,但不会失速。我们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判断是不会“硬着陆”。

在经济低迷情况下，市场对货币宽松加码预期较多；但货币当局一直强调了政策基调的中性稳健，实际行为也着重货币结构的调整，加之货币过分充裕的客观情况，导致市场对货币宽松程度的前景一直存在较大分歧。从货币、信贷增长的速度和规模看，我们认为当前的信贷和货币增长仍然是符合政策基调下的偏高格局。首先,如果把 1~2 月份合并比较，当前的信贷和货币增长仍然是 2014 年以来的高点。其次,仅就当月新增信贷规模和货币增速看,和过去比较,现在的增速并不低。因此,2 月份的回落仅是对 1 月份过快增长的修正,是回归到正常增长而已。我们认为,当前的货币和信贷增长,仍然是偏快的,未来仍然有下降空间。

（作者系上海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

###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说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 0755-83501640；发电子邮箱至 ppll18@126.com。